

社会变革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变革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2425/06

社会变革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0.125印张 263千字

印数0001—1500

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20-8/D·71 定价: 5.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武者小路公秀 (1)
研究社会变革, 推动社会进步	丁伟志 (3)
中国的近代化和政治革命	王庆成 (5)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	
综述	陶文钊 郑则民 (9)
1911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陈铁健 (28)
中国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郑则民 (53)
中国革命和文化	龚书铎 (75)
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	陶文钊 (92)
现阶段中国社会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	邢贵思 (114)
中国革命: 对革命理论的再认识	莫汉蒂 (127)
明治维新与中国革命	山口一郎 (144)
中日兴办近代工业企业比较研究	
(1850年代—1890年代)	万 峰 (155)
苏联、中国、日本的社会变革与现代化	菊地昌典 (169)
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力	
量合作问题的某些比较分析	陈之骅 (187)
中国与墨西哥的革命及农业改革	夏扎·埃利桑多 (197)
近代中国与墨西哥社会变革中的农民	
问题	陈芝芸 (218)
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与国家主权	
——明治维新、中国革命与	
墨西哥革命	罗梅洛·卡斯蒂拉 (225)

社会变革比较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切尔涅雅克 (253)
发展的政治学的详细规划	阿普特 (266)
革命的先决条件——若干比较研究	艾森斯塔特 (294)

序

本书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这次讨论会由联合国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于1987年11月5日至8日在杭州举行。这是联合国大学的社会变革比较研究项目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明治维新，于1983年10月在东京联合国大学中心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墨西哥革命，于1985年3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俄国革命，于1986年10月在列宁格勒举行。

这个项目企图探讨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中，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对这些社会变革的条件和过程进行新的探索，这些社会变革至今仍然对上述社会以至全世界具有现实的和重大的影响。

联合国大学在进行这个项目时，尽力为不同思想派别的对话和多方面的比较方法的探讨提供讲坛。它不是对社会变革的个别理论的正确性与现实意义作出评判。就这样，有关国家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们，讨论了四个主要变革。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这方面已经迈出的第一步，是仔细研读关于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不同理论。

杭州讨论会由于是这一系列会议的最后一次，所以比起前几次会议来，对理论问题和比较研究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在本论文集集中得到了反映。不少参加杭州讨论会的人，也参加过以前的一些会议，熟悉当时讨论的问题，因而能向这次会议介绍东京、

墨西哥城和列宁格勒讨论会的情况。从这种意见交换中，我们确实得到了益处，使我们能在这次议行将结束时，确定进一步的研究日程。

东京讨论会的论文集，已经用英文和日文出版，题为《明治维新：复古与革命》(1985)。墨西哥城和列宁格勒讨论会的论文集，也将分别作为联合国大学社会变革丛书之一出版。杭州讨论会论文集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编者是印度德里大学的曼诺朗简·莫汉蒂教授。它将在不久的将来问世。对中文版感兴趣的读者，也欢迎参阅英文版。

最后，我们愿代表联合国大学，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杭州这座风景优美的历史名城为讨论会所作的极好安排。从国外来的参加者，回去时都带着对这次成功的讨论会的最愉快的回忆，感谢中国主人的热情好客。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丁伟志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庆成教授对讨论会的大力支持和在协商复杂问题上的有力领导。我们自然深深感激近代史研究所的陶文钊教授和郑则民教授，他们编辑了这本杭州讨论会论文集中文版。

联合国大学（文科）副校长

武者小路公秀

1988年7月于东京

（黄沫 译）

研究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丁伟志

联合国大学组织近代非西方国家社会变革的系列讨论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西欧、北美以外的这些所谓东方国家的变革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中极为重要的篇章。当然，这些发生巨大变革的国家，比如大家正在研究的墨西哥、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各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方式和所经历的道路大不相同，这些变革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尽一样。正因为这样，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确实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可资进行对比研究的内容。

我认为这种对比研究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种研究证实，近代史上所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共同需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第二，这种研究证实，各国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各自特殊的国情出发的，都要走自己的路，而不可能照搬北美、西欧的模式，并且也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各国共同遵守的统一模式。因此，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这些国家近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而且肯定会有助于对这些不同国家的现状的认识，有

助于对它们未来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展望。

有一种观点，把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说成是一向封闭的、停滞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也必须承认，当着西方文明突飞猛进的时候，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候，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确实比人家落后了，如同人们常说的，中国变成了死水一潭，失去了朝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正是寻求从这种困境中崛起的过程，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带领广大群众，前赴后继，倍尝艰辛，经受了各种失败和胜利的考验，终于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空前伟大的变革。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就是为了拯救中国而奋斗的广大志士仁人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的历史。为了找到这样一条改革之路，救国之路，中国人民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他们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中国社会一个多世纪来所发生的地覆天翻的变化已为举世所公认。

当然，社会变革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巨大飞跃，但它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更没有结束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国人民在已经实现的变革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为实现现代化而展开了比民主革命更深刻、也更艰巨的社会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革命。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我国人民在关心改革现状的同时，自然也关注其他国家对我国近年来改革的研究，关注着对其他国家改革历史的研究。因此我们殷切期待着学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变革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贡献出更多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预祝这次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的近代化和政治革命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庆成

联合国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定，这次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获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1911—1949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的确，这两次伟大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划时代的事件；研究这两次革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不是说中国近代变革社会的过程是从1911年才开始的。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始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并不是单纯以一次战争作为历史时期的标志，而是说这次战争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的起点。自此以后，中国逐渐地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外国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封建的传统势力仍占主要地位。由此也就引起中国人要改变这种状态以使国家臻于独立富强的种种努力和斗争。这是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开始的，以后又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些学者以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把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改革现状、改革社会的努力称之为近代化运动。也

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革命。我觉得，“近代化”的理论如果否认或轻视历史上的斗争和革命，那的确是不正确的，至少不适用于近代中国历史；但以它作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角度，它同后一种看法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使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历史认识。所谓近代化，它的实现、它的内容，究竟有哪些标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许多研究，有各种说法。有的着眼于实现工业化，有的着重于人们相互关系模式的变化，有的提出综合的标志，包括建立以机器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建立公民普遍参与的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改变，等等。我觉得，无论哪一种说法，这些标志都是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用“近代化”的概念研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考察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国许多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致力种种变革社会的努力，也就是要使中国赶上当时的先进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有助于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注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注意到物质生产、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城乡关系等各个领域传统势力与近代因素的消长，从而比较完整地发现迂回曲折的历史发展轨迹。

但整个来说，中国的近代化并未获得成功。在日本，近代化过程大体上是和中国同时开始的，日本显然比中国获得较大较快的发展。解释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对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过程作一些区别。象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的近代化，基本上是一种自然演化的过程，随着社会内部近代经济因素的发展，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经过政治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和促进近代化，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说来是有限的。另一类国家如中国、日本等则不然，它们的近代化不是由于内部近代因素的自然演变，而是在外部的刺激或压力下，由政府自上而下地通过各种政策把近

代因素注入于现存社会而实现的。这类国家近代化的实现，具有更多的人为的性质；政府、政治领导集团起着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和日本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近代化过程之收效不同，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主要不在于原有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程度的高低，而是在于政治条件的差异。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并且有一批比较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中国，基本上传统性农民革命但带有一些近代倾向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政府联合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了。由一些爱国志士发起的明显要求实行近代化改革的戊戌变法，被清政府的当权者扼杀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实力人物发动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的新式工业为社会注入了某些新因素，但他们不愿触动旧的政治和文化，它的失败和它不可能使中国近代化，是必然的。在半个多世纪中，当时的清朝政府不但不能推动国家的近代化，反而基本上站在近代化的对立面。这也就引起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革命的必要。辛亥革命曾给中国带来希望。它所造成的新的政治统治本身，本来应该就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成果，它本来可以以自己的政策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但它终于没有能把中国引向独立和富强，孙中山的使中国近代化的计划终于落空。这样，中国必然地要发生新的革命，由新的政治力量在新的条件下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事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问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首先提出的。俄国以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历史条件，在1917年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早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补课，去完成本应在这个革命以前已经完成的近代化。当然，这任务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的情况是近似的。由于抗日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引起的人民不满和失望，1949年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中国一百多年来追求的近代化，并且造成一个更公正的社会。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是如何地与政治革命不可分离。中国近代化需要有胜任的政治统治为指导，一切政治力量都受到了中国近代化的选择和考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中国对本国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已有相当的基础，但还有不少薄弱之点。近十年来，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利环境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若干的进展，并且从中外学术交流中得到了教益。这次会议有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多位学者在一起研究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问题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我相信会议的成果一定会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学者，有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有的是初次会面的新朋友，我们欢迎新老朋友到来，并期待着今后有机会继续进行学术交流。联合国大学举办一系列的国际会议，研讨墨西哥、日本、俄国和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促进了学者们对各国历史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友谊，对联合国大学的这种努力，以及联合国大学在本次会议中和我们的良好合作，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后能继续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陶文钊 郑则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同联合国大学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1月4日至8日在杭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12位中国学者和来自日本、墨西哥、苏联、美国、印度和以色列的9位学者。他们自由、热烈、坦率地交换意见，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交流。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联合国大学发起组织的非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变革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以前三次会议都邀请了中国学者参加，各次会议论文集的英文版及所在国文字版已经或正在编辑、出版。

在11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首先致词。他指出，对墨西哥、日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对比研究至少表明，第一，这些社会变革是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共同需求，是不可抗挡的历史潮流；第二，各国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各自特殊的国情出发的，都要走自己的路。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各国近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而且有

助于对各国的现状的认识，有助于对它们未来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展望。他指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是比民主革命更艰巨、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是近代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联合国大学高级官员内田孟男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大学举办非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变革系列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希望与会的各国学者共同努力，使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得到成功，取得良好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接着致词。他说：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获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1911—1949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他在介绍和阐述了中国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看法，比较有关国家近代化过程的异同点后指出，中国对本国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已有相当的基础，但还有不少薄弱之点。他希望这次会议的成果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学术讨论开始。第一天，会议围绕中国学者邢贲思、陈铁健、龚书铎、陶文钊、郑则民的论文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及当前改革的情况；第二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印度、墨西哥、日本等国社会变革的比较研究，提出论文的有印度学者莫汉蒂（Monorajan Mohanty）、墨西哥学者罗梅洛·卡斯蒂拉（A. Romero Castilla）、戛扎·埃利桑多（H. Garza El:zondo）、日本学者山口一郎、菊地昌典和中国学者陈芝芸、万峰、陈之骅。第三天会议的主题是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美国学者阿普特（David Apter）、苏联学者切尔涅雅克（Й. Б. Черняк）提出了论文。

在简短的闭幕式上，王庆成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学者，抱着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态度，通过短短三天的交流，取得了

相当大的收获。他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有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理论、方法、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值得历史学家借鉴。他强调，今后要加强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合作。内田孟男说，应当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研究革命，不是把它当作某个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而是作为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来加以研究，他还认为应当对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他还更多地向与会者介绍了联合国大学的工作情况，表达了增进国际学术交流的愿望。

二

· 与会的中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宏观的考察。

陈铁健在题为《1911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论文中指出，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这个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905—19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他指出，在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和君主立宪的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很难抽象地说哪一种方案更好，美国、法国是共和制，英国、日本是君主立宪，这些国家实行不同的政体，但都实行了现代化。在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照样走不通，而只能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他说，中国是在缺乏充分的物质准备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由此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郑则民在《中国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的论文和发言中，分三个阶段对问题进行论述，即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1911—1927），从南京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1927—1945），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他指出，在第二阶

段，中国土地上先后出现三种类型的经济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日本侵占区是殖民地经济，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国民党在其统治前期所采用的某些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收到某些效果，经济有过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比重有所增长，但外资增长比民族资本更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大肆掠夺抗战胜利成果，使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他们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结果军事败北，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心丧尽。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由劣势转变为优势。解放区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巩固和扩大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龚书铎在《中国革命和文化》的论文及发言中分四个方面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和民主是近代中国的基本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的主题。以儒学为主要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外国侵略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有必要学习西方文化。从开始时学习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知识，到19世纪末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这就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宣传民权、平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对封建文化发起了冲击。但辛亥革命失败后，很快出现了一股封建复古力量。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发起了更大的冲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成为五四政治运动的先导。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在与“全盘西化”论、复古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陶文钊在《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的论文和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与中国革命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